

全球治理秩序的重构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以政治空间嬗变为视角

徐海燕¹, E. N. Grachikov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政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28;

2.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 莫斯科 117198)

〔摘要〕政治空间是国家政治与地理空间相结合的产物,作为地域空间意义上的国家,国家是传统政治空间的核心,空间的文化属性,强调的是共同信仰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超国家行为体形成后,国家的主权空间和权力边界发生改变,同时,国家空间生存论与“丛林法则”“零和博弈”等原则相辅相成,促使西方大国主导的全球治理范式形成。全球化到来,导致国家内外部的政治空间愈加碎片化,国家间的关系日趋多元,原有秩序在全球性危机面前丧失活力,全球治理供需失衡。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需保持战略定力,立足亚太,积极构建以中俄合作为核心的亚太一体化,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新型空间秩序,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与尝试。

〔关键词〕国家;政治空间;治理秩序;对策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0.09.013

一、空间的政治性及其特征

(一) 政治空间的地域属性

政治空间是国家政治与地理空间相结合的产物,是政治生活发展和赖以存在的先决条件。阶级社会产生后,国家是以“国土、版图、领土”为根本构建的最重要的政治实体。^{〔1〕}政治学家认为,在地球表面因地域特征不同,政治现象也是

具有差异的。^{〔2〕}而最早把政治现象和地理环境联系在一起并加以阐述的是柏拉图。他在《理想国》中,探讨了国家应该占据“最合理”的地理位置的问题。古希腊的“城邦”则是“政治”与“空间”相互联系的最直观的政治实体。“城邦”一词来自希腊语πολις,《荷马史诗》记载了雅典人将修建在山顶的卫城称为“阿克罗波里”,^{〔3〕}作为古希腊城邦公民参与统治和管理活动的场所,

作者简介:徐海燕,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比较政治;E. N. Grachikov,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教授,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联合资助项目“世界政治空间中的俄罗斯和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协调国家利益”的阶段性成果。

其兼具了公民政治参与与地理环境的双重涵义。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还注意到了“城邦的地理环境”对城邦政体产生的影响。^[4]

从现代词源上看,“国家”这一概念存在着 state 和 nation 两种与空间相关的阐释。国家(state)是指具体的地域空间内所组成的政治单位。国土、资源、人口、军事力量是其存在的必要物质条件,state 强调的是权力的范围和归属性。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的,国家是在“一定疆域之内”正当行使“暴力的垄断权”的组织机器。^[5]《现代俄罗斯新哲学百科全书》对政治空间的阐释也与政治系统紧密联系;政治空间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政治制度秩序,并使之得以推行、发挥影响力的实际地域范围。^[6]在表述联合国(The United States)时,特指其可支配的权力不受其他国家控制的特点。state 还表示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地理单元,如美国的州、印度的邦、俄罗斯境内的边疆区等。例如,美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是一个由各州组成的国家,所以 United States(合众国)应作为国家全称的组成部分。在不同历史时期,国家都有不同的政治“景观”。在古希腊表现为城邦,在古罗马表现为共和国和帝国,在中世纪欧洲则表现为教会与世俗王权二元结合的政治“图景”。从传统意义的视角看,国家是建立在一定地理空间内的核心组织,其对内部所属的资源具有排他性的管理权,国家空间被看作是建立在固定领域之上的、静态的、封闭的“容器”。^[7]

(二)政治空间的文化属性

作为 nation 的国家是将其作为承载某种集体意识、认同和记忆的地域,是由某种具有共同信仰与意识形态的国民组成,其强调的是国家抽象的民族文化特性,是政治空间的必要组成部分。G. A. 阿尔蒙德曾针对公民文化认同与国家系统的关系进行研究,指出国家的“政治系统是由国民或者选民同立法者、行政官员和法官这些相互作用的角色构成的”,“每个人都是出入于政治系统的”。^[8]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

chael Mann)在《社会力量的来源》中进一步提出,一个有能力的政府,是通过对公民的“教化”而获得政治认同,以及政治合法性的。^[9]哈贝马斯则创造性地将“在国家权力之外”,公民可进行自由批判、商讨公共事务、参与政治活动的场所称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并以此探讨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政治学家舒秀文指出,自社会出现后,国家统治并不追求完全控制国土空间内的一切,而是需要地方和社会的支持和认可,甚至将地方政府是否获得了地方民众的认可作为官员的考核标准之一。^[10]孟德斯鸠则提出了更为全面的观点,即国家的法律制定既要观察“国家自身的文明(传统、宗教等),更要观察国家所处的自然环境(气候、地理等)”。^[11]以地理大发现为界,政治学家对人类的政治活动与地理空间相互关系的考察,立足于国家及其内部结构,形成了行为主义政治学。此后,对全球政治空间上的研究,进一步形成了国际关系学、地缘政治学等学科。

正如人类社会进程并未划定“时代”一样,人类赖以生活和繁衍的自然地理的界限,是伴随着国家形成后逐步形成的。历史上,国与国之间边界形成的原因多样,划分的标准也各不相同,一般可以概括为三种:第一种是自然边界(natural/physical boundary),即以独特的自然地貌作为划分边界的依据。特别是在古代,国家或族群以高山、荒漠、沼泽、河流和海洋等可辨认的地文面貌作为自然屏障,以减缓和阻碍外部势力的侵入。例如,在古代中国,长城作为农耕民族同草原游牧民族的分界线,与该地区 400 米降雨线是重合的。长城以北就是草原游牧地区,并形成了游牧文化,产生了“部落社会”。长城以南是中原农耕地区,受统治阶级所推行的儒家思想影响,形成了农业社会。无独有偶,在彼得大帝时期,历史地理学家瓦西里·尼基季奇·塔季谢夫(Vasily Tatishchev),发现国家山脉两侧地区的动植物有显著不同,主张以乌拉尔山脉作为欧洲与亚洲的分界线,被普遍接受。^[12]第二种是文化

国界 (artificial boundary), 即以民族、宗教信仰、语言、意识形态、心理习惯等因素作为依据划分国界。第三种是几何国界 (geometric boundary), 即不考虑地表上的人文和自然状况, 以经度或纬度等数理位置为依据来划分的国界。如美国和加拿大基本以北纬 49° 作为边界, 埃及和利比亚基本以东经 25° 作为边界。由于地广人稀, 非洲地面缺乏明显的自然边界标志 (如河流、山脉等), 而呈现出一种自然的整体的状态。在殖民主义者入侵后, 边界被强行按照经纬线、几何方法划分出来, 从而人为地产生了 50 多个国家。非洲由此成为按几何国界人为划分国家边界最多的地区。据统计, 非洲国家的边界 44% 是按经线或纬线划分的, 30% 的边界是用直线或曲线的几何方法划分的。只有 26% 的边界属于由河流、山脉等构成的自然边界线。^[13] 埃及部分领土和苏丹边界线就是沿着北纬 22° 线划定的, 南纬 22° 线则构成了纳米比亚与博茨瓦纳的边界。

一般来讲, 传统国家的边界是清晰、稳固的。大多有栅栏或者界桩作为标志, 在地理空间上有明确的定位, 并用国旗等标志物标识。除了国土、人口、资源外, 国家在地理空间所处的位置、形状、国家中心区的分布, 经济、军事力量等都属于国家硬实力的范畴, 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 决定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

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开启, 国家边界的清晰度和稳定性却常常遭受破坏。新航线的开辟、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风云演变打乱了国家固有的边界。“边界”既可以是不同区域在宗教、文化或意识形态差异等方面的体现; 也可能是与家庭出身、公民身份、物质水平和社会职业相关的社会阶层差异的体现。在世界范围内, 经济全球化、东西方意识形态差异、南北差距、民族迁徙等都有可能对原有的边界造成冲击, 使国家间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

二、政治空间的嬗变与新秩序建立

15 世纪新航线开辟之后, 欧洲大国为了获

取更有利的权力和空间, 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争夺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 全球政治空间格局日趋复杂, 大国竞争不断加剧。科技革命突破原有的技术藩篱, 信息传播速度加快, 新技术带来的资金流、商品流、人才流和信息流, 刺激着超国家行为体和区域生产链的形成, 把全球空前地联系在一起, 使全球政治空间在格局和秩序上发生了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 超国家行为体与国际交往原则形成

在全球化格局下, 国家政治空间的主权与边界发生了改变。在世界上占优势地位的行为体在发展方式上已经摆脱传统民族国家的边界限制, 将不同力量纳入统一的职能框架内, 形成了跨国公司、区域联盟、全球性机构、NGO 等超国家行为体。在互相依存的世界里, 所有国家都逐步加入联合国体系。并且, 每一个成员国都需让渡部分国家权力, 共同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公约。虽然超国家行为体有可能使国家主权受损, 但几乎所有国家至少是一个超国家联盟的成员, 国家传统权力空间发生改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必须看到, 作为国际空间的基本单元, 主权国家仍是唯一能够有组织和有效行使权力的机构, 依然是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危机的主体。^[14] 20 世纪下半叶形成东西两大“阵营”, 美、苏两国作为区域性政治空间秩序的主导者, 其作用不但没有被削弱, 反而在区域性空间的合作中发挥了更大作用。从西方“阵营”内部看, 法国、西德、日本都是昔日美国霸权的盟友, 他们之间利益关系清晰、易于达成共识、对国际空间秩序的操控能力较强, 从而对维护西方“阵营”的空间秩序起到较大作用。从苏联“阵营”的内部观察, 东德、罗马尼亚、朝鲜同样在“阵营”的空间秩序中发挥着“同盟军”的作用, 成为巩固联盟的基础性力量。

与此同时, 全球经济贸易发展链条的形成, 促进了各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 使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为了融入全球生产链和区域性生产网络, 单个国家放松了对本国生产要素

的控制,以开放性、透明性和合作性为主要内容的多边主义原则形成。在大航海时代,凭借船坚炮利攫取的有利资源,使西方列强成为世界政治秩序、全球治理规则的实际操控者。在经济层面,则以逐利为导向,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出以西方为中心的产业分工与布局。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贸易产业链条的边缘地区,在产业发展中对西方大国的市场、资本和技术的依赖性较强,最终形成了“中心—边缘”的不平等依附关系。应当看到,在经济大繁荣的背景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中心—边缘”的产业格局中虽然受到西方大国的盘剥,但基本能够在全球经济的大繁荣中“分一杯羹”,从而维持了全球共融发展的格局。

(二) 政治空间拓展理论的提出与丛林法则的建立

全球空间的交融发展,也使政治学家们的认知突破了国家一边界的范畴,将对政治空间的研究纳入更为宏大的视野中。对民族国家政治过程与全球地理空间结构的交互影响进行研究,通过系统化、理论化的分析,为世界主要大国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政治空间和国家影响力提供理论支撑。

19世纪末期,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提出了“国家有机体”理论,对西方大国在全球范围内建构政治空间秩序的“合理性”作出阐释。拉采尔提出,国家就像“生物体”一样,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间,国家“通过扩张领土来增加生存空间”是“必然现象”。^[15]在“零和博弈”思想的主导下,拉采尔赋予国际空间秩序建构以“丛林竞争法则”和“零和博弈”原则。

以拉采尔的理论为基础,美国海军军官、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一书中提出了“海权思想”,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提出了“陆权思想”,荷兰裔美国地缘政治战略学家斯皮克曼在《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中提出了“边缘思想”,意大利将军朱利欧·杜

黑在《制空权》中提出了“空权思想”等。几乎所有的地缘政治学家均以构建和领导“全球秩序”为目标,指出了本国在全球政治空间所应关注的重点区域,为国家的对外扩张战略服务。

20世纪中叶,美、苏两国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加剧。地缘战略学家对国际空间格局的分析站位更高、视野更具全域性。1973年,美国地理学家柯恩提出了“多极世界”的“平衡观”,认为世界各大区域不仅多样而且独具特色,因此,想要处理好各区域间的关系,就必须学会保持各区域“生态学意义上的动态平衡”。^[16]布热津斯基进一步提出,俄罗斯、中国所在的欧亚地区具有特殊意义,美国要维持全球利益,必须在该地区构建一个由“现代化和民主社会组成”的“跨欧亚安全体系”,以避免在这一地区出现“黑洞”。^[17]

严格地讲,空间拓展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就缺乏政治空间的全局观,只是立足于“零和博弈”,鼓励大国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权力空间”,并对其霸权行为做出貌似合理的阐释,但这种理论无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只是为西方大国的国防和外交政策服务,具有强烈的“功利性”。

(三) 西方主导的制度建构和全球治理范式的形成

随着研究的深入,政治学家们发现,除了国土、资源、经济实力外,政治制度建构原则、文明传统、意识形态等对国际政治空间拓展也有很大价值。它能产生强大的吸引力、说服力、话语权,甚至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对于主导国际空间秩序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政治学家彼得·巴克莱奇(Peter Bachrach)和摩尔顿·拜拉茨(Morton baratz)在20世纪60年代联合发表的《权力的两张面孔》《决定与非决定:一种分析框架》的文章中,提出了“权力的第二张面孔”的概念,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了阐释。^[18]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则明确指出,民族国家是世界格局中的主体,但全球化条件下,国家间的利益、联合和冲突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两大因

素的影响。^[19]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国外政治学思想的传入,国内学者也关注到了文化、制度建构原则、政治价值观念等在国内外政治中不可忽视的作用。^[20]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明确将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呈现出的力量称之为“软实力”。在一国内,软实力还寓于人口的高素质发展水平、国家创新意识、政府质量和能力之中。

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和后来居上的美国凭借着科技创新和雄厚的经济、军事力量,成为全球政治空间的占领者和政治秩序的建构者。他们通过血与火的战争在全球范围内划分权力空间和势力范围,凭借着在国际政治空间内的优势地位,将英语作为搭载西方话语体系的载体,将西方的价值理念传播至全球范围。将西方价值观作为“普适思想”,令众多发展中国家产生“凡是富贵之乡必是真理之地”的幻觉,将是否符合西方式的发展道路、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看作是一个国家是否具备发展潜力的基础性条件,奉照搬、模仿西方政治制度和自由价值观的理念为主臬,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作为现代国家走向富强、民主的唯一路径,群起效仿,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极大地拓展了西方软实力的范围。但因水土不服,后期往往造成效仿国经济发展停滞、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等严重后果。苏联解体初期,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标志,将以“民主”“自由”为代表的西方大国的“软实力”推向了顶峰。

三、全球政治空间秩序的重构与挑战

(一)政治空间的碎片化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南斯拉夫解体等使原有的国家边界瓦解,国家领土被重新划分,欧亚地区国家政治空间呈现“碎片化”特征。同时,以数字化为特点的新技术革命,进一步拓展了空间相互作用的范围,大国间的战争不再局限于军事—经济领域,也发生在数字领域。^[21]“数字战争”以特有方式破坏和影响了传

统国家的边界,削弱了国际规则、国际机制、国际制度的权威性,二战后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开始出现新的变革迹象。为了领跑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西方大国一方面将实体产业外迁至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加大对金融业和金融创新的扶持力度,实现从工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发展的转型。但金融资本主义通过“无形的手”造就了美国新富阶层的同时,也造成了就业率下降,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资金、岗位等社会资源的稀缺,使资本主义内部弥漫着浓厚的排外情绪。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尽管“原生的”“纯粹的”族群在全球化进程中早已发生异化,但并不妨碍现有族群对所居地域进行“空间”的“再私有化”,重提种族、宗教、肤色,使国家的内部民众分化成拥有政治和地域归属感的民族,没有地域归属但拥有语言、宗教文化权力的亚民族,以及其他更小的群族。这些群族极力否定文化多元政策,使民众之间的分歧转化为“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身份政治运动”,以所谓的“血统”或“文化”重构共同体,加剧了国家内部政治空间的碎片化。正在发生的“身份政治运动”,与20世纪60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身份政治运动”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曾因提升了美国黑人的政治地位,推动了国家整体性建设而被载入史册。而新的“身份政治运动”的端倪最早可以追溯到冷战结束、欧盟扩容、北约东扩时期,以“老欧洲人”的保守主义、疑欧主义、排外主义情绪为发端,片面强调欧洲文化的纯洁性,而针对“他者”的族群和文化,极具排他性、歧视性,导致国家内部暴力活动激增、政治认同瓦解,在国家内部演绎着“文明的冲突”,给政治秩序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在国际层面,经济危机的蔓延,经济增速放缓,全球经济开始从“增量经济”阶段跨入了“存量经济”阶段。在西方国家内部,产生了强烈的领土—空间的“排他性”诉求,衍生出反全球化、反多元主义的政策取向,将全球人口流动看作是对国家主权和国土资源的威胁,重新强调传统意

义上的疆域和边界,主张强化主权国家的边界控制、限制移民的数量与权利。宣扬贸易保护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部落主义(tribalism)和领地意识。

随着全球性危机加深,新型网络传媒的助力,这一现象已蔓延至全球更多的区域,其规模、活跃度、破坏性不断升级。2016年,以英国脱欧公投为发端,世界上最典型的西式民主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荷兰、匈牙利和巴西等都不约而同地选出了民粹总统,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以意识形态为分水岭的政治结盟运动,要求各个国家选边站队,以达到通过“民主”对抗“暴政”的目的。民粹浪潮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化时代国家—民族的空间边界,使全球边界呈现出碎片化、多样化的态势。

当前,全球化带来的难民危机、金融危机、生态危机、跨国犯罪、网络安全、病毒传播频发,世界从“无限可能性的社会”转变为“无限风险的社会”,治理难度、协调难度加大,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对此,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单枪匹马地建立世界秩序”。^[22]全球性危机迫切呼唤大国承担相应责任和担当,但西方大国则延续早期的“零和博弈”和“丛林法则”思维,倾向于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方式解决问题,维持现有国际秩序的能力和意愿明显走低,消极排外以求自保的心态凸显,使全球治理的供需严重失衡。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在“本国利益优先”的理念下,西方盟友间的共同价值观、宗教传统、历史文化与政治经济制度失去了“纽带”作用。一些传统强国既没有做好承担大国责任的准备,更缺少参与全球重大议程设置的方案,不但公开表达对现有国际规则的蔑视,而且公然退出或废弃诸多现有协定,让西方传统的“契约精神”蜕化为“弃约精神”,从而彻底丧失了承担责任和解决问题的勇气。其中,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堪称典型代表,他的施政方略挑起了美国白人与所谓的“全球化”受益者,包括移民、跨国公司,以及自由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

其宣称维护本国民众的利益与尊严是其制订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可以在不受任何规则和制度的约束下,对任何外来的“威胁”予以还击。在“让美国再次强大”的口号下,立足于北美区域,在全球范围内召回战略性产业和关键性的部门,以重构区域产业生产链。在违背现有国际规则的同时,大力宣传西方传统宗教文化的纯洁性,主张与欧洲、日本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国”重新制定国际贸易规则。同时,将非西方意识形态的国家和经济体视为“威胁”,进行“脱钩”与遏制,大搞贸易战。福山对此评价道,“特朗普的当选,不仅对美国政治而言是一个分水岭,对整个世界秩序而言也是如此”。特朗普及其政策的出台预示着“自上世纪50年代主导的自由秩序受到攻击”。^[23]

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逆全球化风险加剧,供应链断裂、进出口停滞、原油价格下跌、金融资本对经济的冲击进一步显现,停工停产对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尽管每个国家都在努力与疫情抗争,但西方国家以“利润至上”为原则的治理策略,造成全球治理的失序。可以说,上述一切提醒我们,对于世界之命运要进行前瞻性思考:是建立只利于少数国家资本力量的世界及其制度安排,还是建立有利于最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世界秩序,实现最大限度的合作共赢。可以说,答案已经不言自明。

(二) 中国在全球治理空间中的作用及其压力

在新型市场经济体中,无论是在产业资本全球化,还是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阶段,中国因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高素质且便宜的劳动力人口而得以快速发展。当前,中国是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金融总量最大的国家,无论是应对金融危机时表现出的资本控制力,还是奉行多边主义思维和共享发展理念,以及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呈现出的积极姿态和担当精神,均使中国树立起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并日益成为国际格局和全球体系的塑造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冷战结束后,西方大国试图通过“接触”策

略,将中、俄等新兴国家体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使其“同化”为“资本主义阵营”的附庸,以构建屈服于西方的“利益攸关的共同体”。但是,令西方意想不到的,中国在目睹后发国家走西方式道路的代价后,坚持自主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对外关系上,通过“亲、诚、惠、容”外交理念在实践中推进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彰显了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2009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2013年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世界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不断上升。2019年,中国已经拥有110家“世界500强”上榜企业,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目的国和对外投资来源国。^[24]

中国对全球经济在深度、广度上的全面融入,已经使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此引发了本就存在的冷战敌意,以及体制“怨恨”,不断鼓吹“中国威胁论”,大搞贸易战,与中国进行“脱钩”,并加以遏制。2019年11月,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NBR)提交了一份题为《部分脱钩:美国应对与中国经济竞争的新策略》的特别报告,在长达26页的报告中,详细规划了美国与中国从经济上“部分脱钩”,逐步发展到“全面遏制”的战略路径。^[25]包括加强对中国部分进口商品的限制,减缓国家技术向中国的传播,规范商品、资本和人员向美国的流入等。同时,美国强化了与盟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协调了同盟国间的信息共享。这意味着,在现有经济秩序下,美国不再向中国敞开大门,并妄图通过限制中国贸易、资本、关键技术、人才流动等,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对此,中国应未雨绸缪、率先布局,做好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应对的准备。

四、中国的应对及其展望

首先,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保持战略定力。当前,中国正处在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阶段,经济、社会

发展面临深刻转型,但发展的不充分、不均衡等问题严峻,发展的差异性和治理的层次性将长期存在。如果处理不善,极易产生极端主义的土壤,从而对中国团结稳定的政治发展构成威胁。对此,应提高体制的风险驾驭能力,同时保持好内部的战略定力和发展活力,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改革的汇聚力。首要在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及利益多元化格局下,注重解决好民生问题;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不断发挥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及时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失误进行纠偏,关注社会诉求,兼顾各方利益,以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内聚力,提高对外部风险的驾驭能力。

其次,立足欧亚一体化建设,调整战略布局,拓展战略回旋空间。在“逆全球化”政策下,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建立完整的区域产业链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已成为现实的选择。

当前,除了北美、欧洲等一体化机制较为成熟的地区外,亚太地区的一体化建设也已具备了相应的规模。根据2019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提交的相关统计显示,全球500强企业排名中,亚太地区的企业有210家;亚洲区域内贸易在全球占比中达52%,亚太地区互联网用户占全球一半,亚太地区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超过2/3。^[26]亚太地区还存在诸多合作机制与倡议:包括上合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倡议、大欧亚伙伴关系、中亚一体化、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等等。在概念、结构、机制上呈现出多样性。亚太地区一体化机制的多样性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对区域合作和协调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它们只是作为欧亚一体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不代表着欧亚区域的整体化水平。亚太地区国家众多,地理文化、历史国情各异,迫切需要强有力的合作引领者。在诸多的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经济实力、价值理念决定了其成为亚太地区最为强劲的经济增长引擎,以及推动亚太一体化的主要力量;中国是世界数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

一,经济体量在亚太位列第一,是亚太各国倚重的重要市场。^[27]其中,东盟各国的区内贸易额大于区外贸易额。而东盟各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对中国的贸易,而中国向东盟各国提供的上游产品也是东盟各国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作为推动亚洲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最大动力,中国已与日、韩一起,成为在“10+3 机制”下发挥主导力量的国家,^[28]上述表明,在西方逆全球化的政策导向下,亚太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环境已经成熟。作为亚太区域性大国,中国应立足亚太,调整地缘战略布局,将经济战略的重心和巨量的对外贸易从过分倚重东部沿海,转向内陆地区,构建内陆多层次对外开放平台,拓展战略回旋空间,以抵消治理空间的变化造成的消极影响。同时,“积极引进高质量外资,坚持多边主义,突破贸易壁垒,多渠道增加高新产业的产品进口,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夯实实体经济基础”。^[29]

最后,积极构建以中俄合作为核心的亚太一体化建设。当前,在合作共赢理念下,亚太地区各国合作意愿强烈,特别是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下能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融入各类区域性合作机制,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和多边体系的发展。但在体量、实力、领导力方面仍处于发展中。

中俄作为亚太地区有影响力的大国,在引领亚太地区构建新型秩序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中俄都在欧亚地区有重大利益。亚洲战略地位的凸显使曾在外交政策领域长期偏重西方的俄罗斯,将“重返亚洲”政策作为长期的战略。^[30]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后,俄罗斯在2016年提出了“大欧亚伙伴关系”战略。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持有合作共赢、平等互信的理念,俄罗斯强调“团结协作、协调行动,维护全球稳定安全,促进共同繁荣”的理念与中国高度一致。^[31]中俄主导的“一带一盟”的对接与合作是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区域性合作机制之一,对提振亚洲经济,平衡、重塑国际战略空间和秩序发挥

重大作用。

中俄之间有深厚的合作基础。在历史上,中俄都是集合和高效国家建设模式的受益者。当前,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俄关系从“友好国家”到“新型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路走来。中俄合作机制存在于国家元首、中央政府、立法机关、地方政府和基层民众等各个层级中。当前,中俄合作超越了国家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阶段的差异,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是21世纪国与国关系的典范。虽然,对于两国合作的前景也有不同的声音,中俄关系中也的确存在分歧和不对称之处,但双方的合作是主流。中俄或许永远不会结盟,但并不妨碍双方在共同构建亚洲新型秩序时所具备的诚意与实力。

总之,21世纪,科技革命带来全球更深入的交融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征凸显。西方模式的式微,霸权主义的衰落,重塑了西方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基础,改变着其国家治理的基本环境,西方大国应对全球问题的表现,使各国重新审视与反思国际政治秩序的建构原则和西方价值观的“普适性”,从而为亚洲国家的崛起和新秩序的建构提供了可能。面对全球性危机的挑战,迫切要求全球治理理念从“零和博弈”“单边思维”转变为“平等互信”“合作共赢”“多边主义”,只有在全球空间范围内结成“命运共同体”,承担应有的责任,才是现代国家谋取发展的现实选择。

当前,全球政治空间布局和国际治理秩序的建构“从西向东”的端倪已经出现。但应当看到,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道德担当和秩序创造力上已日渐式微,但其依然在设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军工业上占据领先地位。这些均是有利于重塑西方竞争优势的产业格局,是展现全球领导力的必要条件。这也预示着新型国际治理秩序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出现变革的迹象,但争夺全球治理和国

际规则主导权的较量十分激烈。对此,我们要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保持战略定力,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注释:

[1] 罗肇鸿、王怀宁主编:《资本主义大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6页。

[2] Derwent Stainthorpe Whittlesey, *The Earth and the State: A Study of Pol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Inc, 1939, p. 3.

[3]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482页。

[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356页。

[5]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5页。

[6]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Ф РАН; Новая философ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7] John Agnew, "The Territorial Trap: The Geographical Assump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994, 1(1).

[8] [美]G. A. 阿尔蒙德、G. 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64页。

[9]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Vol. 1, pp. 342 - 343.

[10] 舒秀文:《国家影响:中国生态政治素描》,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04页。

[11]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卷),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3页。

[12] [俄]达里雅·科津娜:《透视俄罗斯》, <http://tsrus.cn/lyyou/2014/11/22/38283.html>.

[13] 李琳、张保文:《人生不可不知的文化常识》,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245页。

[14] Не одичать в, осыпающемся мире, <https://ru.valdai-club.com/a/reports/ne-odichat-v-osypayushchemsya-mire/>.

[15] 陆俊元:《地缘政治的本质与规律》,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年,第41-42页。

[16] [美]柯恩:《分裂世界中的地理与政治》,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89页。

[17]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6页。

[18] 刘德斌:《“软权力”说的由来与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

[19] [美]缪塞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缙、张立平、王圆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20] 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21] "The New Landscape of Information Competition",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4-13/making-cyberspace-safe-democracy>.

[22]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489页。

[23] [美]弗朗西斯·福山:《特朗普的美国与全球新秩序》,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227>. 2016-11-21.

[24] [26][28] The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GI), "China and the world Full report July 2019", <https://www.mckinsey.com>.

[25] NBR: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PARTIAL DISENGAGEMENT A New U. S. Strategy for Econom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NOVEMBER 2019, SPECIAL REPORT #82, https://www.nbr.org/wp-content/uploads/pdfs/publications/sr82_china-task-force-report-final.pdf.

[2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的不确定性拖累亚洲经济》, <https://www.imf.org/zh/News/Articles/2019/10/18/na102319-prolonged-uncertainty-weighs-on-asias-economy>.

[29] 涂永红、白宗震:《FDI和高科技品进口对中美贸易结构的影响——基于门槛模型的分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30] 俄媒:《俄罗斯“重返亚洲”是一项长期战略》,《参考消息》2020年2月28日。

[30] 75 лет Великой Победы: обща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перед историей и будущим, 19 июня 2020 года,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3527>.

[责任编辑:刘 璠]